

时代变迁与 思潮激荡

主编 王峰明 蒋耘中

改革开放新时期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研究文集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高校德育中心委托项目

时代变迁与 思潮激荡

改革开放新时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研究文集

主编 王峰明 蒋耘中
顾问 林 泰 冯虞章 刘书林
编务 于 丽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研究”课题的部分内容和先期成果,本书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经济建设与改革”、“思想道德建设”、“文艺思想建设”、“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以及理论界、学术界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分九个专题做出梳理、分析和阐释。课题组成员撰写的这些文章,大多数曾经公开发表过;在收入本书时,作者又进行了斟酌和修订;其中的部分文章,作者还根据最新研究资料和统计数据作了较大修改。当然,为了呈现研究过程的连续性和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主题的统一性和观点的多样化,本书尽可能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和作者各自的观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变迁与思潮激荡:改革开放新时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文集 / 王峰明, 蒋耘中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302-24021-1

I. ①时… II. ①王… ②蒋… III. ①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170 号

责任编辑:王巧珍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240

印 张:27.5

字 数:476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定 价:58.00 元

产品编号:036139-01

序 言

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身)支持下,清华大学一些长期从事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教师聚在一起,成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研究”课题组,探索社会思潮形成发展的规律,以及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青年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教师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从事研究的学科侧重点各有不同,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都参与了事关改革开放走向的社会思潮的论争,写出了一些有质量的文章。大家商议,作为课题研究的副产品,把大家近年发表的有关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希望能为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尽绵薄之力。

梁启超先生把社会思潮形象地描述为“思而成潮”,并说:“非凡思皆能成潮,思而成潮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社会思潮是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产物,不同的社会主体都力图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尤为突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将贯穿于改革开放整个历史过程,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也将是这一阶段始终不渝的历史任务。我们课题组的成员就是从这一历史高度理解和从事社会思潮研究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曾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①,“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②。这实际上是对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两任总书记引导不力和失误的批评。弹指一挥间,20年过去了,现在状况怎么样?应当说,改革开放30年,成就巨大,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日益深化,自觉拥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走向社会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 13 亿中国人民昂扬奋进的历史洪流,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是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社会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消极现象日益显露,各社会阶层利益取向、价值选择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使他们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态度也日益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加速了改革、发展的进程,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冲击也日益加大;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西方某些敌对势力将“西化”、“分化”战略的重点转向中国,他们扶持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族、宗教分裂势力,为改革、发展制造障碍,并制造思想混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社会思潮领域的斗争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当前,对人们影响比较大的错误思潮主要是:第一,“新自由主义”,宣扬“人性自私”和“私有制永恒”,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主张用改良的资本主义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第四,借“普世价值论”宣扬西方“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第五,否定改革开放 30 年的巨大成就,从“左”的方面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体系,企图走回头路,等等。这些错误思潮涉及领域很广,问题层次很深,表现形式日益公开化,某些颇有影响的传媒已成为错误思潮传播的阵地,我们决不能低估这些错误思潮对人们的影响。

面对这种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意识形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并提出了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党组织都真正重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普及也亟待加强和改进。值得重视的是,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远离”政治性、现实性强的问题,只愿做“纯学术”研究的倾向。1983 年邓小平就指出:“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①这些意见对当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4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引领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又进一步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深入回答在当代中国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等重大问题,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我们认为,“六个为什么”是直接针对当前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的。分析和研究社会思潮,也是从一个角度对“六个为什么”所作出的回答。

正是基于对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上述分析,我们这个课题小组的成员非常重视社会思潮的研究,并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主动选择一些人们感到困惑的现实性、政治性很强的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做是有相当难度的,也是需要理论勇气的。这是因为事物的本质往往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多次的过程才能充分暴露。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了30年,一方面,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提供了实践基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深化,还有一些难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现实生活和理论阐述之间也有很多矛盾现象,需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有些问题受实践过程的局限,还不容易一下子全部地把握真理性认识。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课题小组成员坚持直面社会思潮进行研究,并力求以党性与科学性、意识形态性与真理性相统一的标准要求自己。一方面坚持反对“‘淡化’、‘远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倾向,对现实性、意识形态性强的问题不回避,同时又力求科学分析,力求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避免过去“大批判”简单化的历史失误。具体说,要努力做到:在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时,既要弄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要弄清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僵化模式的界限;既要坚持党的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和科学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方向,又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我国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实践。在研究改革开放的问题时,既要敢于正视、正确剖析社会主义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坚持改革,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十分重视、科学分析、不断克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消极现象。在对西方思想流派的研究中,既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

明成果,包括西方思想流派中一切科学的成分和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抵制其错误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一切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在研究态度上,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僵化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要提倡一种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科学探索精神。这可以说是我们对社会思潮研究立场、观点、方法的共识。

当然,课题小组在政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有不同意见。他们共同认为宣扬“普世价值论”的实质是要用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有没有普遍意义的或共同的价值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在共同认为不能照搬西方“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同时,对该不该提“社会主义宪政”有不同意见;在都拥护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对“以人为本”的阐释有一些差异;在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改革方向的同时,对公有制、国有制的改革现状及改革走向也有不同的看法,等等。我们把这些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这些争论也有认识上的是非,也需要争鸣和实践的检验。而且,我们认为,这样的争鸣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贯穿改革开放全部历史进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反映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对立和斗争将不会停息。这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历史必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所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将是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这项伟大历史任务的关键在党,希望在青年;希望更多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关注改革开放的现实,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工作。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要自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善于从人民群众火热的实践中提炼研究课题,善于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努力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①。让我们共同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为宣传和回答“六个为什么”作出我们的贡献。

党的十七大提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也提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

^① 《人民日报》,2005-11-27,第1版新闻稿。

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中央的这些重要精神,是我们编辑本文集的指针。由于本文集的部分文章写作时间比较早,未能充分反映近年来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些重要指示。这些,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充实、完善。

林 泰

2010年6月

前言

坚持马克思主义阵地 抵制错误思潮的影响

我们党历来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终把它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特别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出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同样会出问题。他多次讲到意识形态在苏联演变中的作用,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抵制错误思潮的影响。从十六大以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研究和教育等,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举措。《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又明确地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他强调说,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彻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地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胡锦涛同志的上述论断,不仅指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指明了对待各种社会思潮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这些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存在,必然会冲击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但又不能简单地对待它们,要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入地理论研究和剖析,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引领和抵制。对这些错误思潮漠然视之或简单处理,对社会主义事业都是极其有害的。

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30 周年,在这 30 年中,我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我们在改革之初预期的那样,国民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国在 30 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刚刚结束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和“神舟七号”升空就是一个充分的显示。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 30 年

取得的宝贵经验和出现的问题与不足,特别是总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和问题。我国当前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同全球化和在我国怎样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总结实践经验至关重要。要把以往的经验与教训作为继续前进的基础,推动我们在各个方面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振兴中华、跨入世界强国之林的目的。

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和各种思潮的涌入也对人民思想、信念、理想形成巨大冲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很大困难。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第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学习新思想、新知识的空间,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给我们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元主体经济。利益多元、价值多元,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培育,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方式。这无疑会使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很大难度。第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以及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也会在青年学生头脑中产生某些困惑,形成某些不同的看法。比如,社会腐败现象、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另外还有社会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如何给予正确回答。众所周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很大的难度,有些问题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解决和解答。但是,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得不到解答,人们思想就会产生某些困惑,甚至会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第三,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但同时也使西方的价值观和各种思潮乘虚而入,并且激发了我国某些错误的社会思潮的滋生和泛滥。这些社会思潮和思想倾向,对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培养会发生直接的、深层次的影响,解决起来难度更大,更为复杂。

下面我想着重谈谈当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几种错误思潮。在这里,我讲的是主要社会思潮,而不是一般的学术思潮。这两者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众所周知,在改革之初,西方思潮就开始涌入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中出现的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思想,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我国社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而且愈演愈烈,以致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所以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已经得到有效的解决。要真正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还需做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正如邓小平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我所讲的这几种错误思潮,实质上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畴。

当前,对我国社会,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四种社会思潮和倾向。

一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他们自诩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它试图通过改良主义方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弊病,鼓吹用价值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有的人主张要用这种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甚至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一种理论表现。对这种思潮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影响如此深广,主要是因为它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欧洲国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加之它标榜一种似乎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似乎不给社会带来阵痛和代价,通过改良就可以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消除社会弊病,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所以,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尖锐对立下,特别是在资强社弱的情况下,有些群众就会跟着他们走。另外,利用或夸大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某些失误,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甚至还以“马克思主义”为幌子以欺骗和争取民众。不可否认,民主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它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继承者。民主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起初它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在他们党的纲领中,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取得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为奋斗目标等,这个时期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化”时期;恩格斯逝世后,20世纪初期,第二国际破产,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成为多数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他们纷纷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举起改良主义的旗帜。有的社会党领导人说,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过时,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提出要与资本主义“共同生存”,当好“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等等。这个时期可称为“去马克思主义化”时期;二战后,由于社会主义变成多国的实践,以致世界上一度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更尖锐地诋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

甚至积极参与搞垮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活动,成为国际大资产阶级的帮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说,“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有效方法”。从这位西方著名政要的话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作用。而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如何直接搞垮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也更加印证了这位西方政要的说法。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几点。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点从以上所述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在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中公然写道,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的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在1986年的纲领中,他们仍然把人道主义哲学和基督教视为主要的思想根源。有时谈到马克思的思想也不过是点缀而已。反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中早已明确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甚至认为,主张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反伦理倾向。他们的学者,更是从理论上否定规律性,否定决定论,否定制度的选择,认为主张必然性和规律性就是贬损人和人的作用的宿命论。否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从二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就更加明确地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本质特征,说什么公有制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特效药,在他们的纲领中用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了其战前纲领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规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党国际将其作为过时的观点就不再提及。在这一点上,最清楚地表明了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区别。试图通过社会福利制度解决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加之社会矛盾尖锐化和工人运动的压力,普遍实行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他们称之为“收入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缓和了社会矛盾,但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社会问题,阶级对立依然存在,不仅如此,福利制度本身的问题也日益暴露,有时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在政治上,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是专制主义等。在这一点上,它同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区别。用价值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从第二国际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就不断宣扬他们所谓的“价值”,鼓吹“伦理社会主义”。二战后,更是把这种倾向推向极端,企图用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经济、政治不是主要问题,道德和价值问题才是根本的。在社会党国际的文件中,明确地写着“民主和人权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目的的根本实

质”。他们把自由、公正、互助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把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是争取自由、公正和社会团结的国际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来消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初,就针对这种空洞的道德说教尖锐地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①社会民主党人宣扬的“价值”,显然就是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或者像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全人类价值”。从这里看得很清楚,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是国际大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同盟军。

最后,我引用西方学者的一段话来评价当今的民主社会主义,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这样说:“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其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是“告别社会主义”。

二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它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渗透到我国,目前已不只是一种思潮,作为政治主张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发展表现形式。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前,西方多数国家都奉行古典自由主义政策。在大危机之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进入 70 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陷入经济萧条和危机,而凯恩斯主义也提不出克服危机的有效对策,于是新自由主义就大行其道。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从此新自由主义便上升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对内对外的政策原则。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经济上主张“使经济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快地私有化”,并且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在政治上极力鼓吹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推行美欧式的多党制、民主化,宣扬政治多元化和文化的美欧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化”。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利用由他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试图在世界范围里建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实现他们称霸世界的“新帝国主义梦”。

新自由主义盛行 20 多年来已经给经济不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23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重的危害。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产生的破坏。在那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为了清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重振拉美的经济,拉美人民选择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领导人上台执政。现在有 3/4 的拉美国家由左派领导人掌权。这些左派领导人的主要政治主张,就是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以及美国的霸权战略。拉美左翼运动,用俄共主席久加诺夫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我们见证的正在变红的大陆”。对于新自由主义给世界造成的严重影响决不能低估,但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也正在觉醒。

2008 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主要是由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英国撒切尔夫人任首相和里根任美国总统开始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政策造成的,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20 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及对它的批判从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从拉美国家,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大本营,它像火山一样终于爆发了。现在,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就连他们的政要们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半年多来,有关报导频频见诸报端。比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说“这一后果的始作俑者就是过去 30 多年以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经济政策”。该文写道,“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中,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主义本已名誉扫地,但到 70 年代,由于英国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推崇而重新翻身,成为经济界的正统。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的贪欲”。这里讲得多么好啊!就连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政府管理不力和放任的自由市场的结果。我们应该从世界范围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给不发达国家造成的危害。从我们国家近 20 年来的发展来看,也应该进行认真地反思,消除新自由主义给我们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

三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学术界早已有之。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人们的精神。自 80 年代初期以来,有的人就趁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际,宣扬什么“范式”的转换。还有的人提出“告别革命”,通过“反思历史”否定我们过去取得的伟大成绩,甚至认为,革命运动就是“破坏运动”。《告别革命》的作者很清楚革命运动对我国近现代史的深刻影响,所以,他们居心叵测地提出,对 20 世纪革命实践的反省是“最根本的反省”。他们通过反思所谓“革命后遗症”反对一切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绩,宣扬一种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众所周知,颠覆一

种制度,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从否定它的历史做起,这一点在苏联演变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从这一点来讲,在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1) 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一些人攻击一点,不计其余,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祸害”,《告别革命》对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 20 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正是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09 年历史,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获得伟大成就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可见,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就是为了否定革命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2) 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作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他们有的是通过赤裸裸的谩骂、恶毒攻击的方式,来丑化和否定革命历史与革命领袖,有的则以学术研究为幌子,否定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生造了一个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来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判断。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理论陷阱”。因为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定位,是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结论也都要被改写,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就完全不同了。

(3) 它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则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8年有学者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而把西方的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是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并要求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诚然,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虽然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两种思潮的不同发展趋势及他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是贯穿在五四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他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表明这种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破产了。怎么能够把五四时期历史发展中非本质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为主流传统加以颂扬,并要求今天的中国加以复兴和弘扬呢?^①

与历史虚无主义不同,同时在我国思想界还产生了一种历史复古主义,或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种思潮试图通过复兴古代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倡导一种新儒学,并以此作为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的人鼓吹要“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主义”,以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思潮同历史虚无主义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一个主张“虚无”,以否定一切;一个主张“复古”,以取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其矛头都是指向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样值得重视并给予深入剖析。

诚然,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化无疑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否定了这一点,就会沦为文化虚无主义,也就是列宁批判的那种在虚无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但是,对历史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否定一切和全盘继承都是错误的。孔子文化或儒家文化,对我们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

^① 参见北京大学梁柱教授的有关文章。

它毕竟是它产生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且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对它不能简单地模仿和照搬,更不能用它来代替我们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只能根据今天的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对它进行加工改造,融入到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之中,成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元素。这样研究古代文化,研究国学或国粹,才有现实意义,才有生命力。毛泽东倡导的对古代文化,一要古为今用,二要批判地继承,是十分正确的,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四是普世价值观。近年来,有些人大肆宣扬所谓“普世价值”,认为从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应奉行的普世价值,他们声言要引进“普世价值体系”,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各方面的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并说要“瞄准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所确认的社会经济制度迈开前进的步伐”。显然,热衷于鼓吹这种“普世价值”论并不是单纯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这套所谓“普世价值体系”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这样,改变的就不仅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是我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体现的就是一种所谓“普世价值”观,也就是他说的“全人类价值”,其结果导致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使苏联人民陷入制度剧变、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的历史悲剧和灾难之中。这个严重的事实,难道不正是对其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普世价值”的根本否定吗?

但是,要从理论上深刻剖析由资产阶级学者精心炮制出来的所谓“普世价值”,的确有一定的难度。这里不仅要从历史上阐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的产生、演变和历史作用,以及在当代的表现,而且要剖析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抽象人性论,以及从哲学上阐明人性、价值观中的个性与共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否则很难从理论上驳倒所谓的“普世价值”问题。这里涉及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深层次和根本性问题,涉及两种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本对立。我只是简要地说一点看法,供进一步研讨。价值问题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可以从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角度、层面去进行研究和阐释,可以建成庞大的理论体系。所谓价值,从理论上说,是标志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和效用的范畴,对于一定的主体有没有价值和有怎样的价值,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既同客体的特性和功能有关,又直接取决于一定的利益主体对此的价值判断,即取决于一定的主体的价值观。事实上,对于同一种事物,基于不同利益的主体会有不同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离开了一定利益主体的价值立场、价值